

浙江省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Enlightenmen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nterprises in Province Zhejiang

李永刚

(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

杭嘉湖平原是重要的丝绸产地,宁波商贾的足迹遍布五湖四海。改革开放使浙江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从蛰伏中重新苏醒。1988年浙江乡镇企业产值达到655.7亿元,占农村经济总产值的70%,640万农村劳动力通过各种途径转入了二、三产业,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33%。乡镇企业已成为浙江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浙江乡镇企业发展的特点

1. **多种所有制企业全面发展。**浙江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类型非常复杂,既有比较规范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个体私人所有制企业,又有由个人长期租赁承包的“变形”集体企业,还有私人产权和集体产权混杂不清的“中间所有制”企业,国家、集体、私人联合投资经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及名为集体实为私人的“挂牌企业”。在联户合作企业中,既有以按劳分配为主的企业劳动群众合作企业,又有以雇工经营为主的私人合作企业;既有产权边界清晰的股份制法人企业,又有权益关系模糊的临时合伙企业。对浙江乡镇企业的所有制划分,只是对其主要特征的把握和归类,而不是十分严格精确的界定。集体企业在浙江乡镇企业中占据了主体地位,全省乡、村两级集体企业有95 098家,就业人数达到398万人,产值达496亿元。农村个体私人和联户合作企业1984年以后发展较快,势头看好。1989年,全省个体工商户和私人企业达到350 254家,就业人数达到824 731人,产值达到66亿元;农民联户合作企业达到59 492家,就业人数达到593 609人,产值达到70亿元。

三种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乡镇企业,在地域分

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宁波、绍兴、杭州地区,以乡村集体企业为主;台州地区,以农民联户合作企业为主;温州地区,以私人家庭企业和各种形式的股份合作企业为主。1985年,温州农民家庭企业有13万家,产值达11亿元。此后,温州农民家庭企业逐渐走上了股份合作的道路,以共同抗衡市场风险,形成联合优势和规模效益。1988年,温州全市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有22 833家,年产值20亿元,占全市农村工业总产值的60%。

在产业分布上,不同所有制企业也各有偏重。集体企业以其经济技术力量相对雄厚,在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等技术资金密集的行业中的优势,产值比重超过90%。客货运输、商业零售、饮食服务三个行业,个体私人企业和联户合作企业以经营灵活、利益直接而独占鳌头。而且近年趋势表明,集体企业正从这些行业逐渐退缩,个体私人企业和联户企业则迅速扩展。1988年间,三个行业中的乡镇集体企业,分别减少就业人数8.3%、3%、10.2%,而个体私人企业和联户企业分别增加就业人数16.4%、13.8%、17.6%。在乡镇企业产值总量中,个体私人联户企业虽然只占25%,但在局部地区和一些特殊行业,却占据了主导地位。

2. **紧紧依托市场,重视灵活经营。**外部通达,内部完善,内外功能耦合,各环节和要素相互协同配套的开放性全方位市场体系是浙江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依托,而灵活的经营方式是浙江乡镇企业赖以开拓市场的基本手段。浙江农民素有外出做小生意、手工艺的传统。永康的五金匠,永嘉的弹棉匠,宁波的小商贩,自清末以来就走遍全国。改革开放以后,全省形成了一支50万人的农民供销员队伍,常年奔波于全国各地,把各地的市场信息和商品带回浙江,又把浙江乡镇企业的产品带

往全国,为浙江乡镇企业发展立下了头功。省内农村民间市场也逐渐发育,形成了一个包括各种日用商品市场,各种生产资料市场和资金、技术、劳务、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在内的全方位市场体系。这个市场体系以大中型骨干市场为枢纽,与大量农村民间集市相配套,组成了一个密致的市场网络。义乌稠城镇的小商品市场是浙江农村民间市场的典型,其占地面积和小商品交易量居全国第一,每年光顾的外地客商有几十万人,被香港报纸称为“东亚第一大小商品市场”。温州农村民间市场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全市393个大小市场,专业市场占135个,大型专业市场有10个。如永嘉桥头纽扣市场,集中了全国几乎所有的纽扣品种,每年的纽扣交易量近亿元,是全国最大的纽扣专业市场。这些专业市场,一部分是在某类商品专业生产基地上形成的,是生产专业化、集中化的自然结果,主要功能是为当地专业生产解决产品销路。一部分是在贩销,中转枢纽点上发展起来的某类商品的集散地和专业批发市场。再一部分是在传统集市贸易形态上发展起来的农副产品市场。民间资金市场在浙江省内也初具规模。“私人钱庄”、合作基金会、民办信用社等各种民间金融机构的融资、集资、借贷活动日益活跃,成为整个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85年,温州农村民间信贷用资金达到2亿元规模,占当时农村资金总需求量的30%,成为温州家庭企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

3. 全方位、多形式与国营企业联营协作,利用国营企业的优势“搭车前进”。乡镇企业在一缺资金、二缺技术、三缺管理经验的条件起步,唯有借助国营企业的扶持才能加快自身的发展。浙江紧邻上海,与上海的人员、物资、信息交往十分便利。两地居民之间大量存在的亲缘同乡关系,也为浙江乡镇企业与上海国营企业挂靠联营,架设起许多“暗道便桥”。加上城市的工业和人口载荷较重,场地、交通、住房紧张,因此在开放搞活的条件下,城市国营企业也亟需将自身的生产能力向周围农村扩散。这种城乡互补作用,使浙江50%左右的乡镇企业与上海等城市的国营企业很快建立了全方位、多形式的联营协作关系。乡镇骨干企业与国营企业联营协作的比例更大。据对萧山、绍兴两地303家乡镇骨干企业的调查,与上海等城市的国营企业有联营协作关系的有268家,占88%。通过与国营企业联营,乡镇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有较大程度提高。联营前后厂均固定资产从40.3万元提高到100.9万元,厂均产值从371.1万元增加到574万元,厂均利润率从7.9%提高到11.3%,人均创利从1 629元提高到2 919元。

4. 多渠道、广角度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攀亲“挂钩,依靠科学技术振兴乡镇企业。浙江乡镇

企业技术引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引进“三老”(老师傅、老设备、老产品),属于低层次简单技术引进,引进过程有一定盲目性和自发性。第二个阶段是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引进高技术人才和先进技术,由政府主动出面为乡镇企业牵线搭桥,有选择地引进适合乡镇企业的先进技术和技术人才。第三个阶段是通过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培养乡镇企业自己的技术骨干,并建立乡镇企业自己的科研和新产品开发机构。据绍兴、上虞两县不完全统计,几年来有300多家乡镇企业与全国130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聘请技术顾问600多人,委托培养技术骨干近千人,培训技术工人3 000多人次。有几十家乡镇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科研机构。在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帮助下,两县乡镇企业共开发新产品400余种,其中20种获国优、部优产品奖,100多种获省优产品奖。

5. 充分发挥农民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和核心,在商品经济的风浪中,企业的兴衰成败与企业家有直接的关联。浙江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起用了一大批头脑灵活,视野开阔,懂得经营管理,有较强事业心和冒险精神的农民企业家。如杭州万向节厂厂长、全国著名农民企业家鲁冠球就是典型的例子。发挥这些农民企业家的作用,让他们在生产管理、市场开拓、企业发展决策上充分施展才干,是浙江乡镇企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首先,在乡镇企业厂长经理的配备上,大量使用有一定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头脑的各种“能人”,还通过投标竞争的方式,为企业家人才的涌现和成长提供公平的机会和条件。其次,落实好企业承包责任制,使乡镇企业厂长经理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通过承包将乡村社区所有权、行政权与企业经营权分开,使厂长经理可以独立从事经营决策。第三,提高乡镇企业厂长经理的社会地位。全省对100名作出突出贡献的乡镇企业厂长经理,由省政府授予“优秀农民企业家”称号,还有不少乡镇企业厂长经理被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国家与地方的政务活动。第四,保证乡镇企业厂长经理的合法收入。集体企业厂长经理的收入由基本工资和承包奖金两部分构成。基本工资是工人的1~3倍,承包奖金视承包指标完成情况而定。两部分相加一般都在每年5 000~10 000元之间,少数可达数万元。但只要严格履行承包合同,完成了承包指标,对按承包合同规定应得的收入都保证予以兑现。第五,切实保障农民企业家的经营权利和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对于干涉承包者正当经营权利的行政干预行为和诬告、威胁或用暴力损害承包者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都认真及时地查处。

6. 与小城镇发展相结合, 建立乡镇工业小区。浙江乡镇工业经历了由依村傍户的分散布局, 到逐步向小城镇集中的转变过程。乡镇工业摆脱了“小作坊”、“小匠铺”的传统形态, 发展成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物质生产加工系统, 对交通运输、信息通讯、市场购销、供水供电等基础条件有了更高要求。昔日的村野环境不再适应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的需要, 于是各种基础条件较好的农村集镇, 特别是地处交通枢纽、商客往来频繁的中心集镇, 成为吸引乡镇企业的聚集点。永康县近年来以小城镇为依托, 形成了10个有一定规模的乡镇工业小区, 集中了2 000多万元固定资产和近亿元工业产值。温州市112个建制镇, 集中了全市60%的工业产值, 40%的税收, 61%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和30%的农村人口。

面临的困境和原因分析

1989年, 浙江乡镇企业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 增长速度由往年平均38%下降为8.3%。1990年1~3月份, 又比上年同期下降2.4%, 其中下降10%的有10个县, 下降50%的有3个县。全省有1.6万家乡镇企业关停并转, 还有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开工不足, 100多万乡镇企业职工向农业回流。乡镇企业出现如此大的起伏, 从外部原因看, 主要有:

1. 国民经济总量收缩和结构性调整。1988年第三季度, 国家开始采取压缩信贷投资规模, 调整国民资产存量和增量结构等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 并且实行“保国营、压乡镇”的倾斜政策, 使乡镇企业在资金、能源、原材料方面面临严重困难。1988年7月到1989年1月, 全省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贷款压缩了7亿元, 其中大部分是对乡镇企业的贷款。1989年1~10月, 全省农行对乡镇企业贷款又实际减少4 306万元。国家对棉花、茧丝等重要农产品原料也强化了计划控制, 取消了市场购销, 并将计划内部分重点保证国营企业开工需要, 使一大批乡镇棉纺、丝织企业因原料断档而被迫停业。

2. 国内外两个市场同步萎缩。国内市场从1989年一季度开始出现疲软, 长期旺销不衰的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等高档耐用商品出现滞销, 生产经营厂家纷纷降价促销。如由中德合作制造, 获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的“西冷—利勃海尔”电冰箱, 在短短三个月内由每台2 360元降为1 840元, 降价幅度之大令人吃惊! 1989年全省商品零售实物量比上年下降10%, 今年1~3月份又比去年同期下降5.8%。其中电冰箱销售量下降53.4%, 电视机销售量下降10.6%, 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比去年同期下降11%。长期短缺的生产资料市场也出现疲软, 如塑料、染化料、铅、水泥、木材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比去年下跌10~20%。市场疲软主要有以下原因:(1) 银行利息提高, 消费者储蓄倾向增加。1989年全省居民存款余额近214亿元, 比1988年净增70亿元, 增幅49.7%。(2) 消费者“断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商品在城市居民家庭趋于饱和。据抽样调查, 浙江省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电视机114.5台(其中彩电56.3台), 电冰箱73.4台, 洗衣机67.5台。农村居民由于收入、生活方式、水电供应等条件限制, 对上述商品购买意向很弱。(3) 集团购买力控制过严, 使正常的集团消费严重萎缩。从国外市场看, 由于去年春夏之交风波的影响, 一些外商在对我贸易上一度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 还有一些外商借故取消了已签约的部分合同, 对乡镇企业产品出口造成一些影响。

3. 经济效益下降, 亏损面扩大。1989年, 浙江乡镇企业利润比去年下降14.8%, 百元产值创利下降60.4%, 亏损企业达12 737家, 亏损金额达5.75亿元, 分别比上年增加26.6%和93.6%。1990年1~3月, 乡镇企业经济效益仍继续滑坡, 企业亏损面超过20%。主要原因是:(1) 国家税收增加, 浙江乡镇企业近年新增加5个上交税种, 1989年比上年多交税金3.3亿元。(2) 各种社会性集资收费加重。据鄞县统计, 乡镇企业共负担了补农贴农、城镇建设、文教卫生、社会福利、治安交通、各种赞助共六大类19项社会性开支, 每年因此减少利润5 000多万元。照此推算, 全省乡镇企业每年负担的各种社会性开支达到6亿多元。(3) 煤电等主要能源涨价。电价平均每度上涨0.15元, 煤价平均每吨上涨100元, 仅此两项, 全省乡镇企业要多支付13亿元。(4) 贷款利息上升。乡镇企业额度内工业贷款平均月息1.65%, 拆借贷款平均月息1.92%, 扩股贷款平均月息达2.42%, 与上年相比, 全省乡镇企业1989年多支付利息3亿多元。以上各项累计多支付近20亿元。

4. 政策不稳, “思想疲软”。去年一段时间社会上对乡镇企业出现了各种非议, 对乡镇企业承包也提出了不少指责。使很大一部分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对今后乡镇企业还要不要发展, 企业承包还要不要搞产生了怀疑, 担心政策会变。还有个别地方, 针对乡镇企业厂长、经理的匿名告状信骤增, 调查厂长、经理“问题”的工作组频繁进出厂门, 使一些厂长、经理顾虑重重, 无心于企业经营。这种政策上的摇摆虽然历时不长, 但对乡镇企业干部职工却造成很强的心理冲击。

从内部原因看, 主要有:

1. 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 与国营企业有很

大同构性,导致生产加工能力与原材料供给及市场需求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浙江国营企业是一种以轻纺为主的结构,仅纺织、缝纫、食品、塑料四大行业的产值就占总产值的50%,其中纺织、缝纫工业占28.9%;而乡镇企业中纺织、缝纫、食品、塑料四大行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48.9%,其中纺织、缝纫工业占38.5%,不仅与国营企业结构重合,而且强化了纺织、缝纫行业比重过大的特征。近几年来,浙江乡镇小棉纺厂、小丝织厂、小啤酒厂纷纷开工上马,如德清一个县就有100多家小丝织厂,全省小啤酒厂有上百家,导致棉花、茧丝、啤酒等行业的生产加工能力大大超出原材料供给和市场消费能力。以棉花为例,全省乡镇企业棉花加工能力为每年47 000吨,国营企业棉花加工能力为每年35 000吨,但省内棉花年产量只有43 000吨,缺口近40 000吨。

2. **企业素质较差。**全省9万多家乡、镇集体企业,年产值上百万元的不到一万家。大部分企业规模小,厂房简陋,设备陈旧,30%左右的设备是国营企业撤换下来的二手设备。全省通过标准化验收和三级计量的只占集体企业的1.5%和1.4%,在产值超百万元的骨干企业中,也只占15%和14%。一些企业原材料入库无检验,生产过程无质量检测控制,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资金管理混乱。如上虞县停产的128家乡镇企业,经分析,38家是因管理不善造成的。

需要克服的深层障碍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1952年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83.5%,到1978年仍高达73.8%。改革开放10年来,由于发展乡镇企业,有4 400万农村劳动力转入了二、三产业。但到1987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仍占61.1%。据全国8省10县定点调查估测,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5亿之多。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在500万人左右。解决如此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总量和结构性剩余,根本出路在于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总体劳动就业结构由金字塔型转变为倒金字塔型;而基本路径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以乡镇企业为载体,推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为此,要克服以下一些深层障碍。

1. **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低层次劳动力大量冗余,高素质劳动力严重短缺。**从浙江省的实际情况看,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特别是管理技术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向二、三产业转移的严重制约因素。全省乡镇企业职工中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只占41.8%(其中大专文化的只占0.18%,高中以上文化的只占10.7%),小学文化和文盲占58.2%;有中

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只占0.13%。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工人不到8%。不少厂长、经理还带有浓厚的小农意识,采用拼设备、挖老本的掠夺性经营方式提高个人承包收入,对现代管理知识和技能掌握甚少;在劳动管理上,只会采取“定额”计酬的简单方法。在国营企业普遍放开搞活,国外商品和技术大量涌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乡镇企业就难以继续生存。

2. **城市高素质劳动力大量冗余和闲置,与农村劳动力结合渠道不畅。**首先,现行中高等人才教育培养体制,导致高素质人才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集中。大专院校每年从农村招纳大量优质后备劳动力,这些人毕业后绝大部分留在城市工作。结果使农村高素质劳动人才越来越稀缺。这种对农村的人才“剥夺”比经济上对农村的“剥夺”更有伤农村经济的“元气”。其次,在城市,由于分配机制扭曲,高智能劳动和简单体力劳动的报酬倒挂,影响科技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再加上人才的地方和部门所有制,科技管理人才不能自由流动和合理使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大量被闲置。少数人停薪留职,自己创业,虽然成效颇丰,但终因受不了各种冷眼、讥讽、或明或暗的梗阻,以及政策上的限制而又重新回原单位工作。再次,城乡二元体制使城市科技管理人才难以同农村劳动力结合成新生生产力。尽管乡镇企业迫切需要科技管理人才,甚至花费重金聘请,但愿意放弃“城里人”的地位和各种福利条件到乡镇企业工作的,人数寥寥。

3. **农村城市化滞后,影响乡镇企业长远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工业是一种聚集产业,它要在特定的时空界限内,集中较多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经由人力作用达到各种物理、化学、生物变化,生产出人类所需的物质产品。一个企业的各道工序、环节、流程要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时空整体。从整个社会生产大系统中,不同企业也要形成一个密致的企业群区,以节约信息传递、市场交易和共同服务的中间费用和时空耗损。过去一段时期,由于对现代二、三产业这一内在特征认识不足,导致乡镇企业布局上出现“村村办厂、处处冒烟”的散乱状况。从国家来说,这不利于对乡镇企业进行税收、质量、工商、价格、环境污染管理,也不利于为乡镇企业提供水电、交通、通讯、商业、文化等服务,同样不利于对乡镇企业进行技术、管理、经营方面的指导。对乡镇企业来说,增加了生产经营过程的困难和成本,不利于提高企业自身的素质。而且从第三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只有城市发展起来了,商业、交通、饮食、服务、文化、教育、科技、信息等第三产业才会繁荣,从而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第三产业是未来劳动就业容

(下转第64页)

四、高强度运输与安全行车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

我国铁路运输密度,自1974年超过日本以后,一直仅次于苏联居世界第二位,走高强度运输的路子,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拚设备,吃老本并不是高强度运输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没有及时强化改造既有铁路,低装备水平不适应高强度运输。1986年以来进一步实行了高强度运输,由于贯彻执行了打好技改翻身仗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建设经济路网的指导思想,从而加快了资金积累,设备失修欠帐的状况已逐渐有所好转,安全设施明显加强。

但是,1988年初全路发生三起惨重行车事故后,有人认为“行车密度越高,事故越多”“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实,这三起惨重事故都发生在中低行车密度和中低运输密度的地段。当然,提高行车密度,增加列车重量,实行高强度运输,会增加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但同时,遵循客观规律,也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减少事故。事实上,由于对管理不善、纪律松弛和安全设施差采取了有力措施,在运量和运输密度继续增加的情况下,1989年行车安全明显好转,重大事故下降6.4%,险性事故下降20%。国内外铁路运营经验都证明,只要提高职工素质,加强管理,严格纪律,提高设备的现代化水平,就既可扩大运能,又能提高安全度。例如,处在运输密度最高区段之一

的蚌埠铁路分局,已1 000多天无行车重大事故。而国外,行车密度最高,运输密度较高的日本铁路,1985年,行车密度和运输密度约分别为1955年的2.5和1.5倍,事故率却不到1955年的1/7;据1988年初的资料,近10年来只有2起旅客死亡事故,且均因自然灾害所致。其新干线高速度高密度行车,1964年通车以后未发生过重大事故。至于苏联铁路,1956年~1970年的15年间,由于加快了铁路电气化的步伐,推动了铁路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在铁路运量增长1.56倍、运输密度提高1倍的情况下,事故的年平均数反减少了63.8%,1978年运输密度达到2 448万换算吨公里/公里(相当于我国1988年的水平),比1970年提高20%,事故又进一步减少。可见,高强度运输与安全行车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今后,开发信息技术,提高行车控制和调度指挥的现代化水平,并相应地加强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就可以在进一步提高运输密度的同时提高安全度。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国情,在争取较大幅度增加铁路投资的同时,应该把有限资金优先用于发展以电气化与信息技术为先导的先进技术装备,强化更新改造既有铁路,力求尽快缓解既有铁路运能的紧张状况,尽快消除因设备失修而造成的隐患,并根据需要与可能,积极修建新线,才是摆脱我国铁路困境的根本出路。

(责任编辑 宋义荣)

(上接第28页)

量最大的产业,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应向第三产业转移。浙江农村虽然形成了一批乡镇工业小区和专业生产集镇,但农村集镇总体布点过多,规模过小,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不明显。应该改变这种星罗棋布的农村小集镇发展战略,重点建设一批农村骨干工业城,使之逐渐达到10~20

万人口、10~15亿元产值,成为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想之所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具有强大内在活力的新“极点”。

(责任编辑 冷远猷)